

「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對 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之影響

朱 美 智

摘 要

一、為尋求主要國家經常帳再平衡之道，須 探討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原因

過去 20 多年來，國際貿易迅速發展，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問題卻日益嚴重。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經常帳長期逆差（商品帳呈逆差、服務帳呈順差），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大陸則經常帳長期順差（商品帳呈順差、服務帳呈逆差）。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不僅引起各種貿易爭端和摩擦，而且提高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為尋求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解決之道，必須探討其背後的原因。

二、在國際分工背景下，因製造業優勢國經常帳多呈順差，服務業優勢國經常帳多呈逆差，主要國家經常帳長期失衡

1990 年代以來所發生之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情況，所具有的主要特徵為，經常帳順差國與經常帳逆差國之間存在明顯的分界線，亦即經常帳順差國往往在製造業、製造品出口具有比較優勢，而經常帳逆差國通常

在服務業、服務出口具有比較優勢。

加上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主要國家經常帳持續失衡的過程，同時也是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的國家專業於發展製造業，有的國家專業於發展服務業，各國比較優勢因而不同，為提升福利，致進行「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進而帶動商品與服務的全球生產與跨境流動，導致各國經常帳（包含商品帳與服務帳）發生變化。因此，「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是造成主要國家經常帳長期失衡的主因。

本文利用各類衡量「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之指標，對全球各國 1990、1995、2000、2005、2010 及 2014 等 6 年的資料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專業於製造業國家多呈現經常帳順差，而專業於服務業國家多呈現經常帳逆差，從而驗證「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導致這些國家經常帳失衡。

三、因服務貿易開放程度較商品貿易小，製造業優勢國經常帳多呈順差，服務業優勢國經常帳多呈逆差

至於為什麼專業於製造業國家多呈現經常帳順差，而專業於服務業國家多呈現經常帳逆差？主要原因為，服務貿易壁壘廣泛存在，導致可貿易服務（tradable services）貿易之開放程度小於商品貿易，使得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服務帳逆差之規模小於商品帳順差之規模，經常帳長期呈順差，反之，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服務帳順差之規模小於商品帳逆差之規模，經常帳長期呈逆差，因而引發主要國家經常帳持續失衡。

四、美中消弭製造業與服務業間發展落差，有助解決經常帳失衡

鑑於在可貿易服務貿易之受限程度較大的情況下，「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引發主要國家經常帳持續失衡，致美國提出

「製造業復興計畫」，中國大陸推動以服務業、內需為主的經濟轉型，可緩解這些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近年多數先進經濟體所得差距加大，助長反全球化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然而，這股反全球化潮流，並非解決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問題的明智對策，因為任何一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即使可能暫時縮減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規模，但既不利全球福利的增加，也不利各國經濟的發展。助長並惡化 1930 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原因之一，即是美英等國採取高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停滯，係前車之鑑。

展望未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能否獲得健全調整，將取決於諸多關鍵因素，特別是，主要國家平衡產業結構的進展，以及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的決心。

一、前言

自國際貿易發展以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問題即持續存在，惟於今為烈。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會引發各種貿易爭端及經濟問題，不利經濟長期發展，並提高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註 1）。因此，長期以來，主要國

家經常帳失衡一直是各界關注的重要議題。

研究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根源，對於欲透過各國間的協調合作、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以有效緩解經常帳失衡問題，有著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所要解答的核心問題

（註 1）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與金融危機的關係，有三派看法：（1）Dunaway（2009）等學者認為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是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因之一；（2）孫震（2012）指出，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使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升高；（3）Borio and Disyatat（2011）等學者認為，全球金融危機主要係因寬鬆的監管政策及金融創新等共同作用所致，與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沒有關係。為求思慮周延起見，本文採折衷的看法，即（2）。

是，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經常帳的主要構成是商品帳與服務帳，故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意指主要國家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失衡，而「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呈現的是商品與服務的國際生產與跨境流動，因此兩者之間關係密切。加上與此波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相伴而生的是，「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之深化。因此，本文的探討重點之一為，「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如何透過對商品帳與服務帳的影響，來影響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此外，另一探討重點為，「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

衡的驅動機制是什麼？

本文的架構除第一節前言以外，第二節說明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日益嚴重，第三節指出現有文獻對於經常帳失衡根源之觀點的侷限性，加上與此輪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相伴為生的是「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因此可以國際分工角度分析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第四節以「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角度來剖析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之根源，並進一步探討驅動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之背後因素，最後展望未來何種策略將有助於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緩解。

二、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日益嚴重

本節主要說明近年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嚴重情形及所顯現的特徵。

（一）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一度緩解，但自 2011 年起持續擴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主要國家共發生三次大規模之經常帳失衡。第一次發生在 1970 年代初期，美國經常帳順差持續減少，西歐國家經常帳順差持續增加，海外美元大量增加，使得美國無法實現美元兌黃金的承諾，導致「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美元因而大幅貶值。第二次發生在 1980 年代中期，美國經常帳逆

差對 GDP 比率達 3%~4%，經常帳順差國主要為日本及西德等，為緩解經常帳失衡，美國、日本、西德等國簽訂廣場協定（Plaza Accord），導致美元對日圓及馬克匯價明顯貶值。

最近一次發生於 1990 年代以來迄今，此輪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不僅幅度最大，也對國際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帶來巨大風險。1990~2015 年，各國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廣泛參與國際貿易，全球商品貿易規模從 3.5 兆美元擴大至 16.5 兆美元，成長 3.7 倍，年均增速為 7.0%；全球服務貿易規模從 0.8 兆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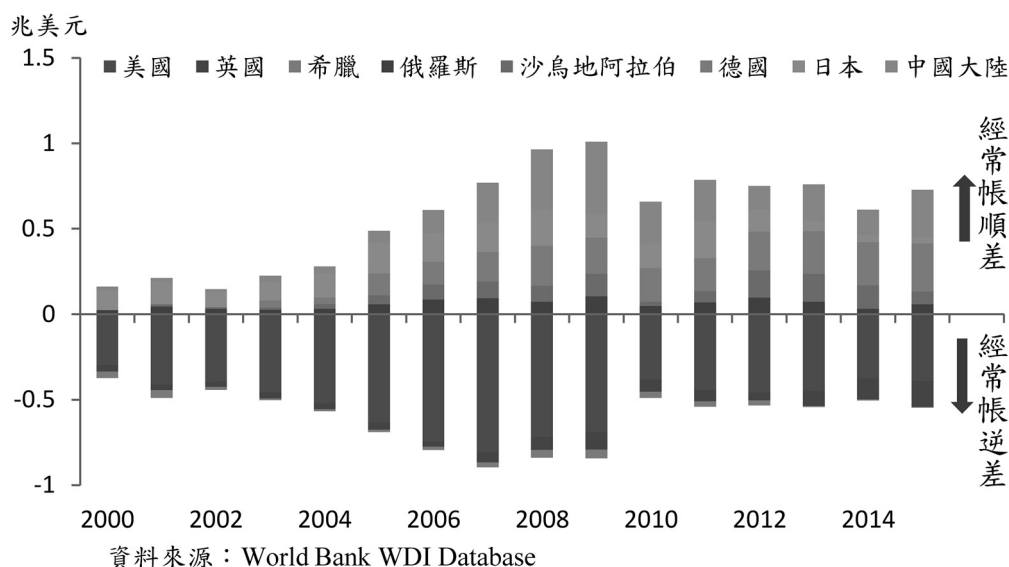
擴大至 4.8 兆美元，成長 4.8 倍，年均增速為 7.5%。合計起來，全球貿易規模從 4.3 兆美元擴大至 21.3 兆美元，成長 4.0 倍，年均增速為 7.1%，而全球經濟年均成長僅 2.7%，全球貿易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不過，隨著全球貿易快速增長，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卻愈加嚴重。儘管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一度出現緩解，但從 2011 年開始，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規模仍處於歷史高位（見圖 1）（註 2），成為困擾各國政府的棘手難題。

隨著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問題日益嚴重，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先進國家或地區之經常帳逆差逐年擴大，債務成長加快；相對

地，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之經常帳順差不斷增加，外匯準備急劇膨脹。2015 年美國及希臘之經常帳逆差、經常帳逆差對 GDP 比率、政府債務對 GDP 比率分別為 4,841 億美元、2.2%、105.8%及 1.2 億美元、2.5%、178.4%。而中國大陸則經常帳順差達 3,306 億美元，經常帳順差對 GDP 比率為 2.6%，外匯準備居全球第一，達 3.3 兆美元。經常帳大量順差國家除亞洲新興經濟體以外，尚包括德國、日本等製造業相對服務業具比較優勢的工業化國家及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等產油國家（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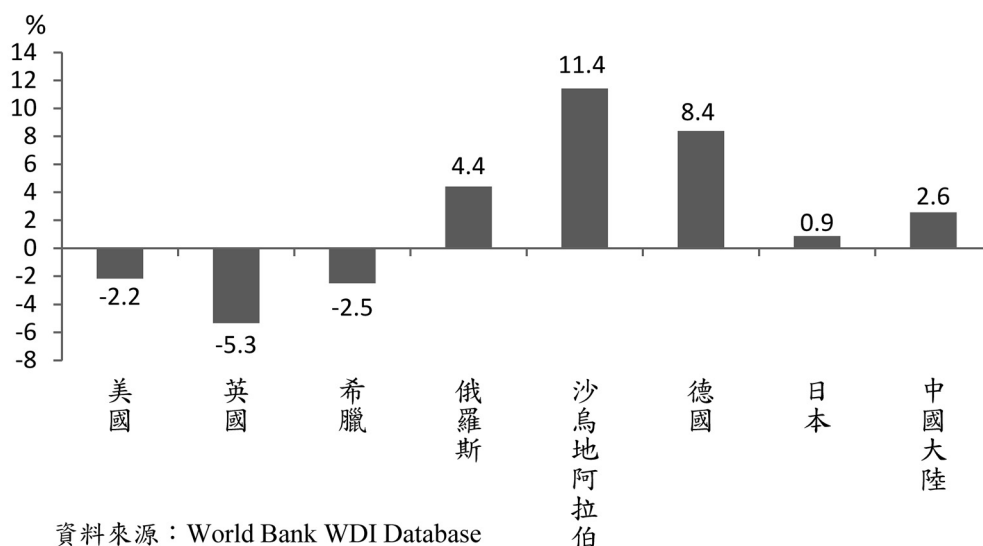
Deutsche Bundesbank（2015）指出，就 1990~2013 年期間，主要經常帳順差國及逆差國而言，商品帳失衡及服務帳失衡為構成經

圖 1 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情況



（註 2）IMF（2014）及 Deutsche Bundesbank（2015）亦持相同看法—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問題仍然存在，彼等就國際收支統計進行分析，顯示近年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規模雖然較巔峰期小，但仍處於歷史高位。

圖 2 主要國家經常帳餘額對 GDP 比率
(2015 年)



常帳失衡的主要部分。易言之，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反映主要國家商品帳與服務帳的失衡，諸如，美國、英國、希臘商品帳呈逆差、服務帳呈順差；而中國大陸、德國、日本、俄羅斯及沙烏地阿拉伯則商品帳呈順差、服務帳呈逆差（見圖 3）。因此，本文不討論所得帳。

（二）此輪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特徵：持續久且幅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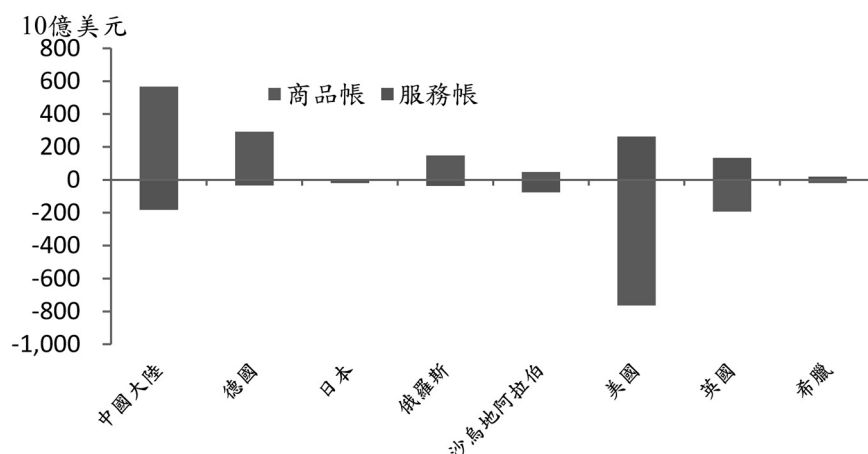
此輪（自 1990 年迄今）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涵蓋，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先進經濟體的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其中美國是全球最大經常帳逆差國，中國大陸是最大經常帳順差國。

再者，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商品貿易失衡嚴重。2015 年美國為全球最大商品進口

國，商品帳逆差 5,670 億美元，中國大陸為最大商品出口國，商品帳順差 7,593 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貿易逆差自 2000 年以來不斷擴大，年均增速為 11.0%，並構成兩國商品帳失衡的主要部分。2015 年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貿易逆差達 3,672 億美元，占美國商品帳逆差的 48.4%，占中國大陸商品帳順差的 64.8%（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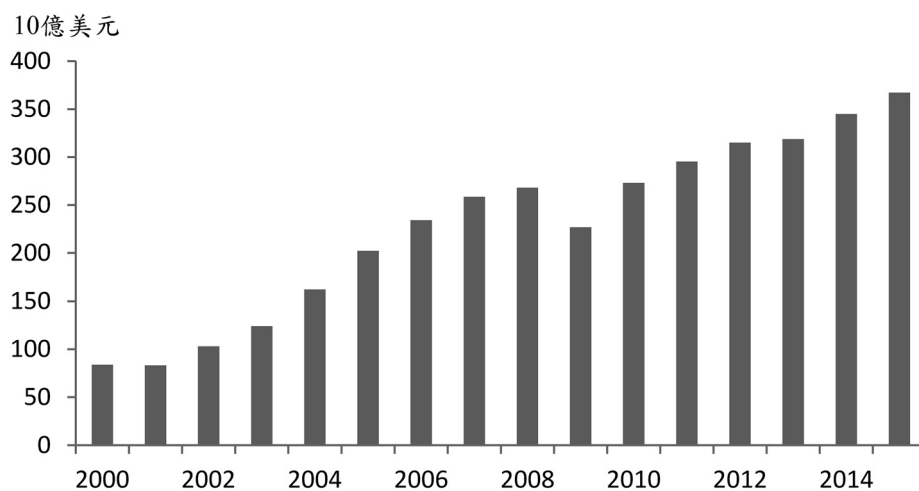
此外，此輪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之持續時間長、失衡幅度大，由此引發嚴重危機。2000~2015 年，經常帳持續順差國家如中國大陸（見圖 5），外匯準備從 1,718 億美元增加至 3.3 兆美元，年均增幅達 22.1%。巨額的外匯準備雖然有利於抵抗風險、維持匯率穩定，但也帶來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化、準備資產收益率低、貨幣升值等問題。同期

圖 3 主要國家商品帳及服務帳餘額
(2015 年)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圖 4 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貿易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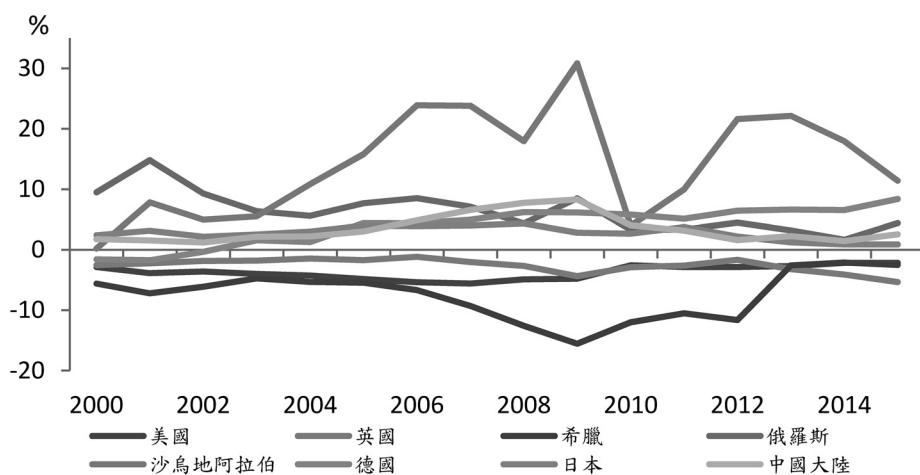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

間，經常帳持續逆差國家如美國，其淨負債之增加高於所得收入之增長，外國投資者將對持有美國資產充滿疑慮，美國利率水準恐

驟升，未來對國外負債之成本恐高達至難以持續之水準（註3）。

（註3）蔡炯民（2006）。

圖 5 主要國家經常帳餘額對 GDP 比率
(2000~2015 年)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三、傳統對經常帳失衡之原因分析

本節說明傳統文獻對經常帳失衡原因的主要看法，以及這些看法的侷限性。

(一) 傳統以政府財政、匯價扭曲、金融市場絕對程度差異分析經常帳失衡原因

什麼因素導致一國經常帳失衡？傳統文獻主要持三種觀點：

- 1、經常帳失衡是因投資與儲蓄之間存在缺口所致，而政府財政收支、人口結構透過一國儲蓄率來影響經常帳餘額

國民所得恒等式為：

$$C + I + G + X - M = C + S + T$$

$$CA = X - M = (S + T) - (I + G)$$

.....①

其中，CA 代表經常帳餘額，X 代表出

口，M 代表進口， $(X - M)$ 為淨出口（即經常帳餘額），S 代表民間儲蓄，T 代表政府稅收淨額（政府儲蓄）， $(S + T)$ 代表國內儲蓄，I 代表民間投資，G 代表政府支出淨額， $(I + G)$ 代表國內投資。

如果一國儲蓄多於投資，會出現儲蓄過量，該國就會以經常帳順差的形式出口本國的儲蓄；如果一國的儲蓄少於投資，就會出現投資需求缺口，該國就會以經常帳逆差的形式進口其他國家的儲蓄。所以，很多學者從儲蓄與投資之間的缺口去研究經常帳失衡。

上述①等式亦可表示為： $X - M =$

$$(S - I) + (T - G) \text{②}$$

其中， $(S - I)$ 為民間超額儲蓄， $(T - G)$ 為政府財政收支。

雖然一國政府財政支出過大，會導致經常帳失衡，惟政府財政收支對經常帳餘額的影響仍須視民間超額儲蓄所造成的影響（註 4）。

此外，一國民間儲蓄率的變化會導致民間儲蓄與民間投資出現缺口，進而引發經常帳失衡。從人口結構角度來探討民間儲蓄率變化的原因，人口撫養比（註 5）是常用的工具。De Santis and Luhrmann（2006）分析 130 國之 1970~2003 年資料發現，一國人口撫養比與民間儲蓄率呈負相關，進而與經常帳餘額呈負相關。

2、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居霸權地位以及少數

國家操縱匯率，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屬於「新興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當布列敦森林體系剛成立時，美國是中心國，而德國、日本是「周邊國」。德國、日本透過人為壓低匯率，累積大量外匯準備，引發美國經常帳龐大逆差、德日經常帳大額順差。爾後德國、日本隨著

經濟進一步發展，逐步讓匯率浮動。目前東亞新興經濟體取代德國、日本，成為「周邊國」，但「中心國」仍然是美國。東亞國家普遍勞動過剩，致政府傾向於干預匯率，使本國幣對美元維持穩定，以此支持出口導向型戰略，解決國內就業問題，同時實現經濟高速成長。而東亞新興經濟體累積的巨額外匯準備，會以購買美國的主權債券等形式回流美國，使美國的經常帳逆差得以持續（註 6）。

3、不同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差異，亦為經常帳失衡之原因

金融市場發達國家在風險分散上具優勢，可吸引其他國家資金不斷流入，致經常帳持續逆差。

新興市場國家則因為金融市場發展較為落後，金融工具欠缺，不能為國內儲蓄提供安全性高、流動性佳的金融資產，因此超額儲蓄就會流入金融市場發達國家，來追求穩定的投資收益，形成一種對外資產，即經常帳呈現順差（註 7）。

（二）傳統分析經常帳失衡原因之侷限性

上述觀點分析經常帳失衡原因均有侷限

（註 4）根據 Roubini & Sester (2004)，政府財政收支對經常帳餘額的影響，可分為三種情形：（i）若民間超額儲蓄為零，則財政赤字必然導致經常帳逆差；（ii）若民間超額儲蓄大於零，則財政赤字不必然導致經常帳逆差，主要取決於民間儲蓄與民間投資缺口的大小；（iii）若民間超額儲蓄小於零，則必然同時出現財政赤字與經常帳逆差。

（註 5）人口撫養比是指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14 歲及以下和 65 歲及以上人口數）對勞動年齡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比率；少兒撫養比是指 0~14 歲人口對 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

（註 6）Dooley M, Folkerts Landau D and Garber P.（2009）。

（註 7）Caballero, Ricardo J., Emmanuel Farhi and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2008）。

性。諸如，若因政府財政或匯價扭曲導致經常帳失衡，其結果必然是暫時性，最終所得變化及價格調整會促使經常帳趨於平衡；但這與目前所觀察到的主要國家經常帳長期失衡之事實不符。至於第三種觀點，則僅考量金融市場的絕對發達程度，但與德國等國金融市場發達而經常帳卻長期順差之事實不符；據此，應考量金融市場相較於製造業的

相對發達程度，始能符合現實情況。

鑑於上述觀點的侷限性，加上觀察到與此波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相伴而生的現象是，「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是當前國家間分工之主要形式，因此下文將以國際分工角度來分析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原因。

四、國際分工加上可貿易服務之開放程度低，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帶動商品與服務的全球生產與跨境流動，導致各國商品帳與服務帳發生變化（註8），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即一些國家商品帳持續改善、服務帳持續惡化，經常帳長期順差，另一些國家則商品帳持續惡化、服務帳持續改善，經常帳長期逆差。

加以經常帳順差國與經常帳逆差國存在明顯的分界線。無論是利用中國大陸、美國等主要國家資料畫趨勢圖，還是就全球跨國資料，採用各類衡量「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之指標進行檢驗均顯現，製造業

具比較優勢國家多呈現經常帳順差，而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多呈現經常帳逆差（註9）。綜上所述，「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是導致此輪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重要原因。

而可貿易服務（註10）（tradeable services）的開放程度較商品開放程度低，則驅動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之商品帳順差的規模大於服務帳逆差的規模，致經常帳呈順差，而服務業具比較優勢的國家之商品帳逆差的規模大於服務帳順差的規模，致經常帳呈逆差。

（註8） Deutsche Bundesbank（2015）指出，近年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前兩大來源來自於商品帳及服務帳，因而本文聚焦於商品帳及服務帳，不討論所得帳。

（註9） 此處指的是一般情況，並不絕對是製造品具比較優勢國家一定出現經常帳順差，服務出口具比較優勢國家一定出現經常帳逆差。

（註10）根據 OECD，服務區分為商業部門服務，及公共部門與個人服務兩大類，前者包括零售、批發、餐飲、運輸電信、郵政、金融、保險等，屬於可貿易服務，後者包括公共管理、國防、醫療、社會工作、個人服務等，屬於不可貿易服務，本文探討的對象聚焦於可貿易服務。

（一）近年「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 成為國家間分工主要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進行農業與工業間的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先進國家之間進行產業內分工；1980、90 年代以來，除了隨著生產過程的國際化，產品內分工逐漸成為重要模式，越來越多國家亦參與「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

形成「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基礎，主要為兩方面：（1）各國產業結構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有的國家經濟重心還在製造業，有的國家經濟重心已在服務業。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兩類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國際分工時，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經濟重心在製造業的國家往往以從事製造業、出口製造品為主，經濟重心在服務業的國家通常以從事服務業、出口服務為主。（2）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要素投入分為有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等），及無形要素（如制度、法規等）。勞動力、資本豐富國家往往專業於製造業，制度、法規具比較優勢國家則通常專業於服務業。另外，國際分工模式亦受文化稟賦的影響。如德國、日本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較高、也擁有良好的制度與法規，但製造業仍是其最重要支柱產業，係因日本文化之認真、守時、服從、勤勞、集體主義等，及德國文化之勤奮、準時、嚴謹、追求完美、一絲不苟

等非常適合製造業發展的要求所致。

1、製造業優勢國特徵：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重、商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較高

新興市場國家及傳統製造業大國在發展製造業上具比較優勢。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大陸、東協，利用豐裕且廉價的勞動力，出口相對低端消費品和低附加值中間投入品。傳統製造業大國，如德國、日本等，透過其戰後累積的大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並充分利用自身特有的適宜製造業發展的文化稟賦優勢，大量生產並出口高端消費品和高附加值中間投入品。以上反映在近年來的經濟數據，就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重而言，中國大陸、德國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就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中國大陸低於世界平均水準，而德國雖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但低於美英水準。就製造業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比重，中國大陸、德國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就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比重，中國大陸低於世界平均水準，而德國雖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但低於美英水準。

本文利用商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與全球商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的比值，來建構一國的商品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標（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若一國的商品出口 RCA 大於 1，則表示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反之小於 1 則表示製造業不具比較優勢、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另利用服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與全球服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

的比值，來建構一國的服務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標（RCA）。若一國的服務出口 RCA 大於 1，則表示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反之小於 1 則表示服務業不具比較優勢、製造業具比較優勢。

就商品出口 RCA 而言，中國大陸、德國及日本大於 1，則表示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就服務出口 RCA 而言，中國大陸、德國及日本小於 1，則表示服務業不具比較優勢；另就商品出口為服務出口的倍數而言，1990~2015 年，中國大陸、德國及日本之平均值分別為 8.9 倍、6.1 倍及 6.0 倍，明顯高於 4.0 倍的世界平均水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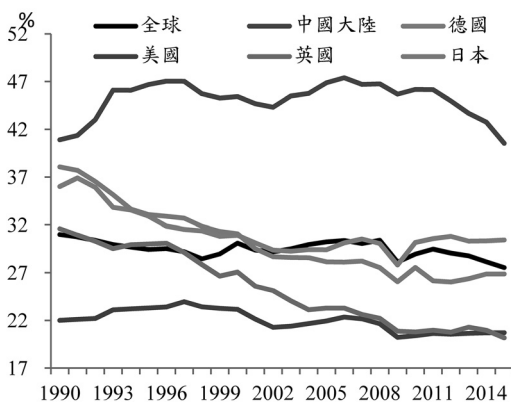
2、服務業優勢國特徵：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服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較高

倚賴制度與法規的優勢，美國和英國等先進國家之金融業等服務業勞動生產力相對較高，服務業相對製造業具有比較優勢，加

上國內勞動成本上升及環境承載壓力增加，致將不具比較優勢的製造業透過對外直接投資（FDI）轉移至勞動和環境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自身則專注於服務業，如上游融資、研發和下游物流、行銷等生產性服務業，對外貿易表現主要為進口製造業商品、出口服務。以上反映在近年來的經濟數據，美國、英國之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並大於其自身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重，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重則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服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商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則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商品出口為服務出口的倍數則顯著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比高於世界平均水準，製造業就業人數占比則低於世界平均水準（見圖 6~1 至圖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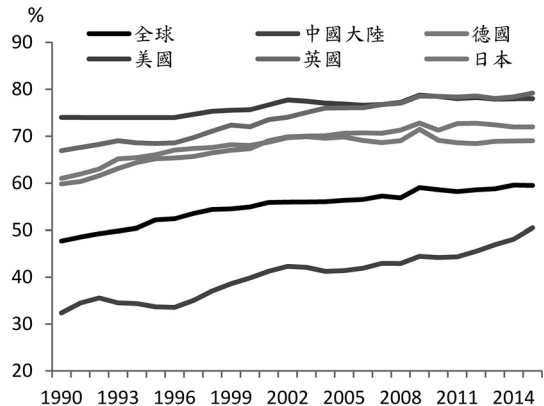
當製造業與服務業環節的分工進一步發

圖 6-1 全球及主要國家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重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圖 6-2 全球及主要國家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圖 6-3 主要國家商品出口 R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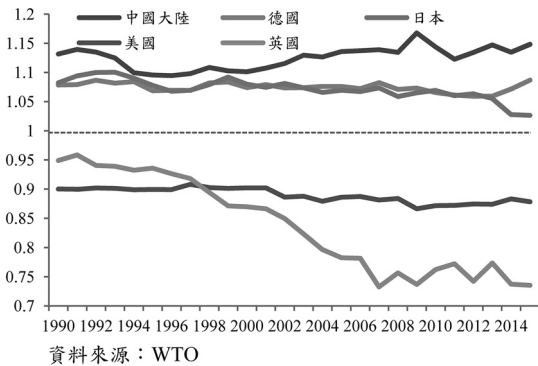


圖 6-4 主要國家服務出口 R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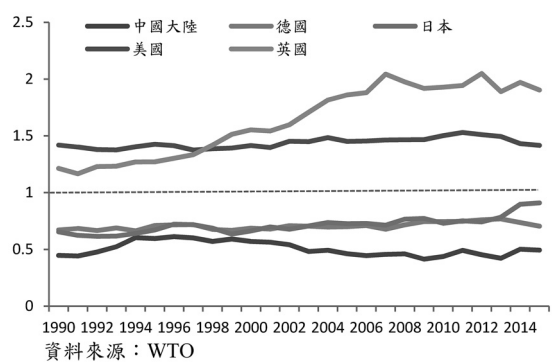


圖 6-5 全球及主要國家製造業就業人數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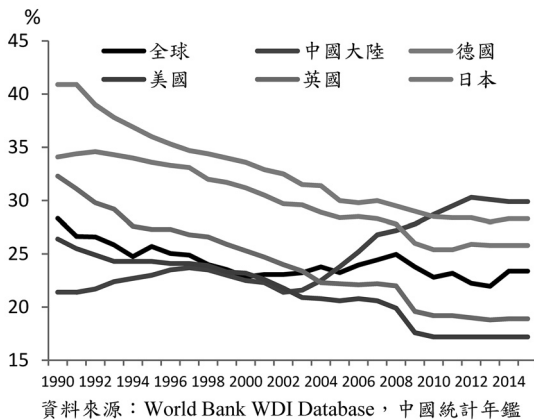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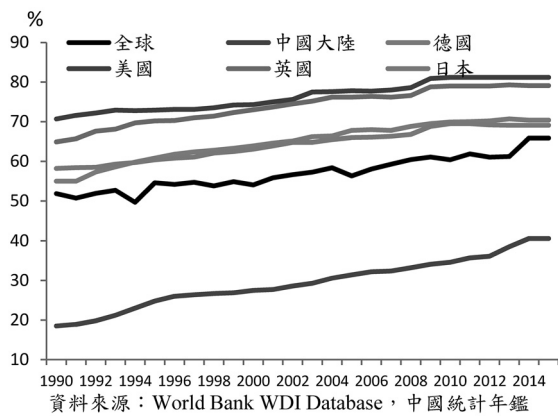


圖 6-6 全球及主要國家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比



揮規模效應，在地理上形成集聚，則出現一部分國家或地區以服務業和服務出口為主要經濟成長動力，而另一部分國家或地區則以製造業和商品出口為主要經濟成長動能，這種分工格局的進一步深化就催生出「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形態。

(二) 在可貿易服務開放程度較低下，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1、「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1) 中、德、日製造業具比較優勢，經常帳多呈順差，美、英服務業具比較優勢，經常帳多呈逆差

就失衡規模較大國家而言，中國大陸、德國、日本憑藉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專注於製造業的生產與出口，國際收支大抵表現

為，商品帳順差持續擴大、服務帳逆差持續增加，服務帳逆差不足以抵銷商品帳順差，以致經常帳順差持續增長。例如，1990~2015年，中國大陸商品帳順差從92億美元擴大至5,670億美元，服務帳逆差從2億美元增加至1,724億美元，致經常帳順差從120億美元增長至2,774億美元；德國商品帳順差從720億美元擴大至3,004億美元，服務帳逆差從260億美元增加至470億美元，致經常帳自2002年以來均呈現順差，從

398億美元增長至2,813億美元。1996~2010年，日本商品帳均呈順差，服務帳均呈逆差，經常帳均呈順差；2011~2015年，在東北大地震造成福島核電廠核泄漏事故，使日本增強對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的依賴，進口能源金額暴增之特殊因素推動下，商品帳才呈逆差，惟服務帳均呈逆差，經常帳均呈順差（見圖7~1至圖7~3）。

美國、英國等服務業強國則專注於服務業的發展與出口，國際收支表現為，商品帳

圖 7-1 中國大陸經常帳、商品帳及服務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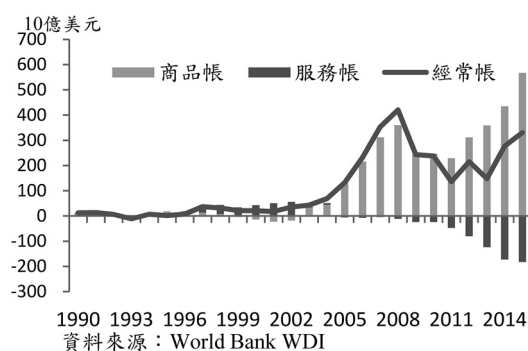


圖 7-2 德國經常帳、商品帳及服務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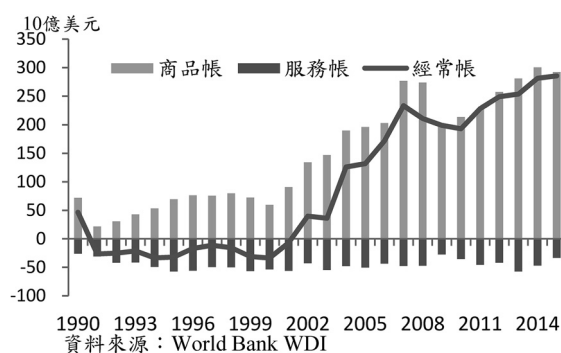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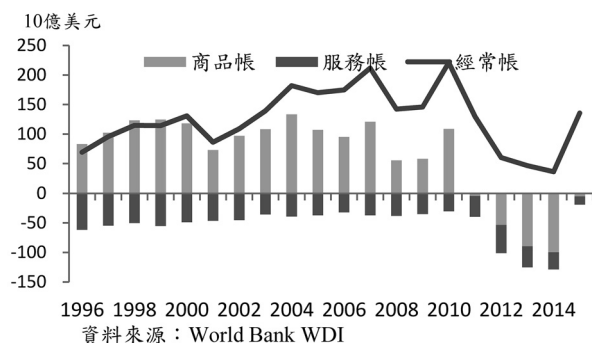


圖 7-3 日本經常帳、商品帳及服務帳



逆差不斷擴大，服務帳順差不斷增加，服務帳順差不足以彌補商品帳逆差，以致經常帳逆差持續增長。例如，1990~2015 年，美國商品帳逆差從 769 億美元擴大至 7,593 億美元，服務帳順差從 458 億美元增加至 2,196 億美元，致經常帳逆差從 516 億美元增長至 4,841 億美元；英國商品帳逆差從 325 億美元擴大至 1,915 億美元，服務帳順差從 77 億美元增加至 1,354 億美元，致經常帳逆差從 190 億美元增長至 1,469 億美元（見圖 7~4 至圖 7~5）。

（2）就全球各國而言，製造業優勢國多呈經常帳順差，服務業優勢國多呈經常帳逆差

當今國際分工強調的是比較優勢，而非絕對優勢，致以 1990、1995、2000、2005、2010 及 2014 年等 6 年全球各國或地區的商品出口對服務出口比率，分別與其經常帳餘額對 GDP 比率進行迴歸分析（見表 1），結果顯示，（1）在一定程度上證

實，商品出口對服務出口比率與經常帳餘額對 GDP 比率之間呈正相關，且相關關係顯著，顯示商品出口具比較優勢國家（即製造業具比較優勢）之經常帳多呈順差，商品出口不具比較優勢（即服務出口具比較優勢、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之經常帳多呈逆差。（2）1990 年以來商品出口對服務出口比率的自變數係數大致走升，證實「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對各國經常帳失衡的影響大抵呈增加趨勢。

2、可貿易服務受限程度較大，驅動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為什麼製造業或商品出口具比較優勢的國家往往商品帳順差之規模大於服務帳逆差之規模，產生經常帳順差，而服務業或服務出口具比較優勢的國家則通常商品帳逆差之規模大於服務帳順差之規模，造成經常帳逆差？本節旨在探討「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之驅動機制。

圖 7-4 美國經常帳、商品帳及服務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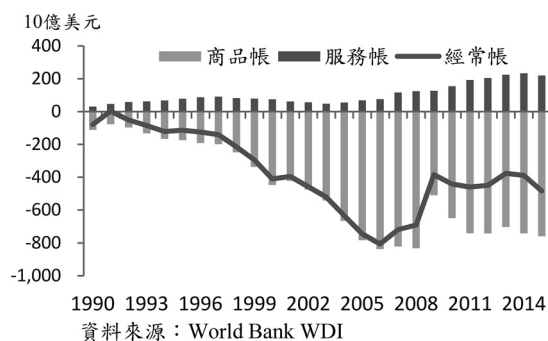


圖 7-5 英國經常帳、商品帳及服務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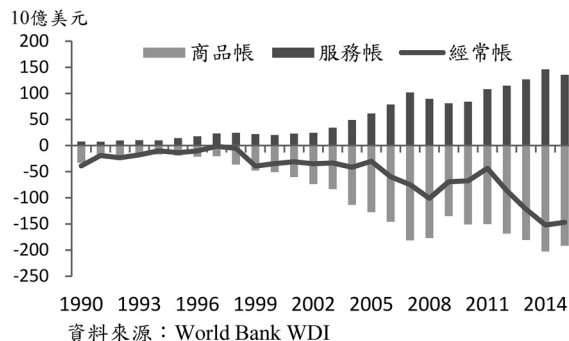


表 1 全球各國或地區商品出口/服務出口與經常帳/GDP之關係（迴歸分析結果）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常數項	商品出口/服務出口	常數項	商品出口/服務出口	常數項	商品出口/服務出口
經常帳/GDP	-3.95***	0.0016***	-4.18***	1.29E-09***	-3.51***	0.0032***
	(0.79)	(0.0004)	(0.88)	(3.19E-10)	(0.81)	(0.0012)
	2005年		2010年		2014年	
	常數項	商品出口/服務出口	常數項	商品出口/服務出口	常數項	商品出口/服務出口
經常帳/GDP	-4.09***	0.0033***	-4.08**	0.0025***	5.64***	0.0731*
	(0.98)	(0.0012)	(1.60)	(0.0006)	(0.62)	(0.0435)

說明：括弧內為標準誤差，*、**、***分別代表在 10%、5%、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可貿易服務開放程度較小，驅動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根據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與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透過國際貿易進行交換，雙方福利均能獲得改善。因此，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可透過出口商品來填補進口服務所造成的缺口，若該國的商品淨出口多於服務淨進口，則經常帳將呈現順

差；商品淨出口少於服務淨進口，則經常帳將呈現逆差；商品淨出口等於服務淨進口，則經常帳將呈現平衡。反之，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可透過出口服務來填補進口商品所造成的缺口，若該國的服務淨出口少於商品淨進口，則經常帳將呈現逆差；服務淨出口多於商品淨進口，則經常帳將呈現順差；服務淨出口等於商品淨進口，則經常帳將呈現平衡。若服務貿易及商品貿易均完全開放，在價格機制的作

下，一國的經常帳長期將自動趨於平衡。

但是，目前實際情況是，中國大陸等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之經常帳長期呈現順差，而美國等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之經常帳長期呈現逆差。為何理論與實際情況不符？

這主要係因商品貿易及可貿易服務之貿易開放程度的非對稱性。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因商品貿易大幅自由化，比較容易將製造業商品出口至其他國家；而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則因種種服務貿易壁壘，比較不易將服務出口至其他國家。

例如，中國大陸在製造業具比較優勢，2015 年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重及製造業就業占比分別為 40.5% 及 46.9%，因隨著全球平均關稅的進一步降低，商品貿易自由化獲

得顯著成就，商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超過 8 成，與製造業在經濟的地位相稱。反之，美國在服務業具比較優勢，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及服務業就業占比分別為 78.0% 及 81.2%，因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展緩慢，服務貿易受到各國嚴格管制，服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僅 32.1%，與服務業在經濟的地位較不相稱（見表 2）。

綜上所述，在「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已然形成之情況下，由於全球可貿易服務之貿易開放程度較低，貿易壁壘程度較高，很多服務本來能夠出口變成不能夠出口，導致服務業具比較優勢國家無法透過出口服務來平衡經常帳逆差，製造業具比較優勢國家無法透過進口服務來平衡經常帳順差，進而引發主要國家經常帳長期失衡。

表 2 全球及主要國家「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相關指標
(2015 年)

		製造業產值 /GDP	服務業產值 /GDP	製造業 就業人數占比	服務業 就業人數占比	商品出口 /總出口	服務出口 /總出口	商品出口 /服務出口
全球		27.5	59.5	23.4	65.9	77.4	22.6	3.4 倍
製造業優勢	中國大陸	40.5	50.5	46.9	47.0	88.8	11.2	7.9 倍
	德國	30.4	69.0	28.3	70.4	84.1	15.9	5.3 倍
	日本	26.9	72.0	25.8	69.1	79.3	20.7	3.8 倍
服務業優勢	美國	20.7	78.0	17.2	81.2	67.9	32.1	2.1 倍
	英國	20.2	79.2	18.9	79.1	56.9	43.1	1.3 倍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2）各國對服務貿易多加以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解決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問題，以美國為首的 23 個國家在經過多次談判後，1947 年於日內瓦簽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但是，當時由於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非常小，因此貿易談判聚焦於商品貿易議題（主要包括降低關稅及消除非關稅壁壘）。此後，經過多輪回合的談判，商品貿易談判獲得顯著成果。目前全球商品貿易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已降至 3% 以下，而且 WTO 會定期評估商品貿易的關稅稅率，並且設置專門機構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些努力大幅促進全球商品貿易的自由化，商品貿易因而快速發展，商品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已超過 8 成。

相對而言，許多國家出於保護國內相關服務業的目的，以及對服務貿易監管的困難，加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考量，致不敢貿然開放服務部門，因此服務貿易的談判起步較晚，且進展緩慢，成效不大。服務貿易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逐漸有較明顯的發展，直到 1986 年烏拉圭回合的貿易談判才第一次涉及服務貿易。雖然 1995 年簽訂第一個針對服務貿易的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但在 GATS 的規範中，國民待遇原則和市場准入原則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各成員國可依據自身情況分別做出承諾，這大幅降低服務貿易多邊協定的約束力。此外，GATS 對各國國內政策並未嚴格限制，使得很多國家雖然對市場准入做出承諾，但是卻可合法透過設置諸多營運障礙來限制國外服務提供者的營運。由於服務貿易的特殊性，大部分的貿易壁壘不是以關稅形式出現，而是一國政府對服務貿易採取的各種管制措施。按照烏拉圭回合的談判結果，服務貿易壁壘可分為影響國民待遇的措施（註 11）及影響市場准入的措施（註 12）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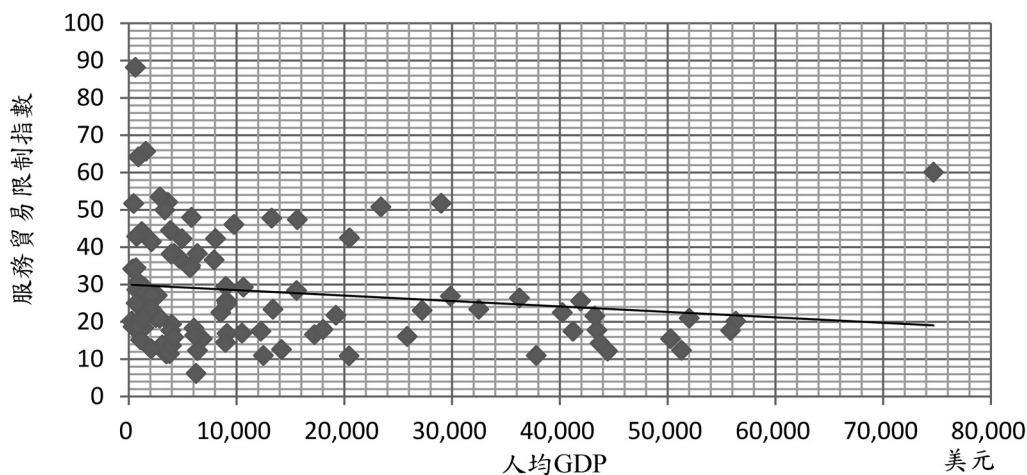
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ervice Trade Restrictions Index, STRI）用於衡量各國服務貿易的限制程度，指數越大代表貿易限制程度越高，指數越小則代表貿易限制程度越低。整體來看，全球各國對服務貿易的限制程度不同，而且人均 GDP 越低，限制越明顯（見圖 8）。就地區而言，則以海灣合作委員會（GCC）（註 13）及南亞的貿易限制程度較高，歐洲、中亞及經濟暨發展組織（OECD）的貿易限制程度則較低（見圖 9）。就行業別而言，平

（註 11）例如，在涉及工業產權的保護領域，不給予外國服務提供者與本國服務供給者相同待遇。

（註 12）例如，採用數量配額，來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數量；對參加的外國資本限定其最高股權比例或對累計的外國資本投資額予以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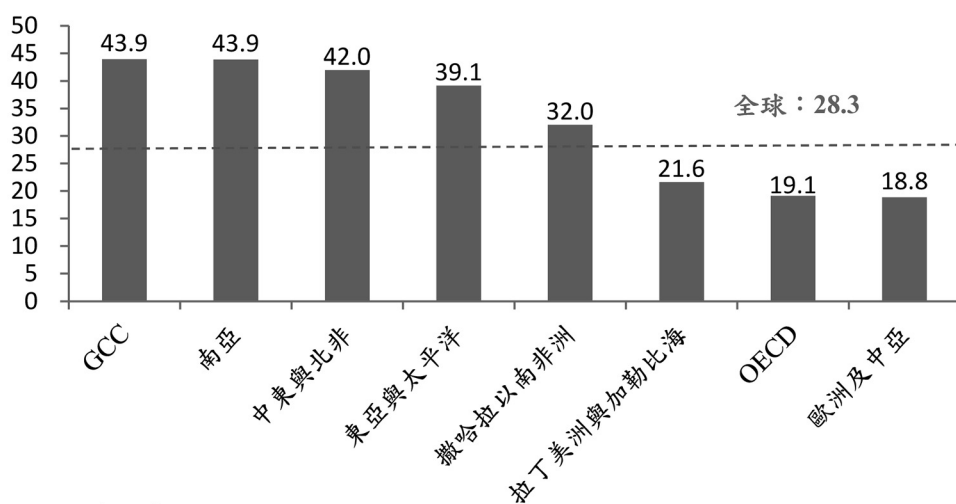
（註 13）海灣合作委員會之成員國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巴林、卡達、科威特及沙烏地阿拉伯。

圖 8 全球各國服務貿易限制指數與人均 GDP 之關係
(2015 年)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World Bank STRI Database

圖 9 各地區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



資料來源：World Bank STRI Database

均而言，以零售及金融之服務業的貿易限制程度較低，專業及運輸之服務業的貿易限制程度則較高（見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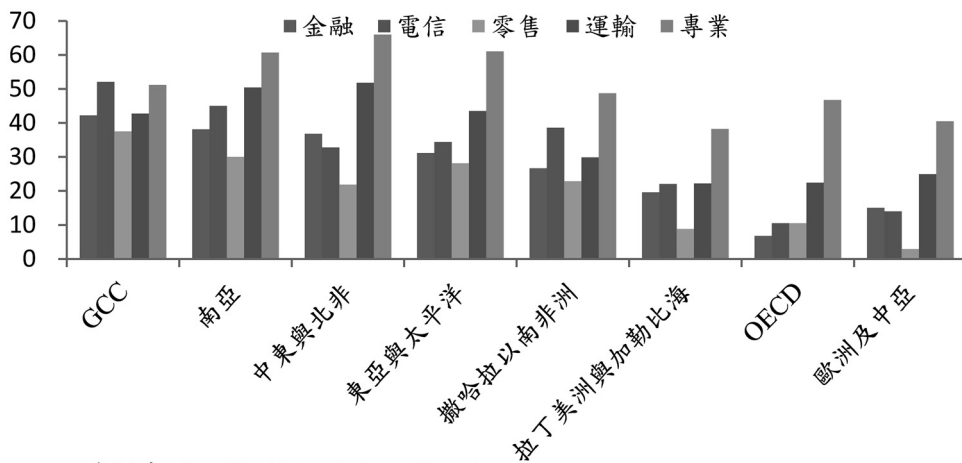
（三）模型支持在可貿易服務開放程度較低下，國際分工導致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

假設在最極端的情形下，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一個國家專業於製造業，將出口製造品、進口服務，導致商品帳順差、服務帳逆差，而另一個國家則專業於服務業，將出口服務、進口製造品，導致商品帳逆差、服務帳順差，由於商品的可貿易性較高、關稅障礙較低，服務的可貿易性較低、非關稅障

礙較高，此兩國商品帳失衡的規模會大於服務帳失衡的規模，致前者國家經常帳呈現順差，後者國家經常帳呈現逆差。將此最極端情形進一步推演，不難呈現主要國家經常帳均失衡情況。而當今中國大陸、德國及日本等國家專業於發展製造業，美國、英國等國家專業於發展服務業，隨著越來越多經濟體參與「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推論此一國際分工模式將造成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日益擴大。

Alessandro Barattieri（註 14）（2014）利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以 66 個 OECD 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國際分工相關指

圖 10 各地區產業別服務貿易限制指數



資料來源：World Bank STRI Database

（註 14）Alessandro Barattieri 是國際經濟領域的著名學者，論文曾發表於 BIS Working Papers、Boston Fed Working Papers 等，2016 年 9 月並獲邀參加歐洲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主辦的「全球價值鏈時代國際貿易與總體經濟的相互依存度」（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研討會之與談人。

標數值，與其經常帳餘額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服務業，而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的比較優勢在製造業，以及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不對稱（即服務部門的開放程度較商品部門低）是造成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重要原因。前者原因

約可解釋美國經常帳逆差的 50%，後者原因可解釋美國經常帳逆差的 20%。申薈（2013）亦透過建構計量模型證明，「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是造成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重要原因。

五、美中消弭製造業與服務業間發展落差，有助解決經常帳失衡

（一）美中等國採取平衡製造業與服務業之策略，有助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緩解

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會提高金融危機發生的風險。目前當務之急是各國消除各種服務貿易壁壘，提高服務貿易開放程度；同時，主要國家將經濟結構調整重點放在，平衡製造業相對服務業的重要性，導正「製造業－服務業」的國際分工之失衡。這不僅可緩解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而且可平衡這些國家的內部經濟。

經濟規模最大且失衡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及中國大陸，目前所採行有助於緩解經常帳失衡的策略如下：

- 1、美國針對商品貿易逆差大、服務貿易順差小所導致經常帳長期逆差之局面，提出「製造業復興計畫」，期能變成偏向生產導向型經濟體。
- 2、中國大陸則針對商品貿易順差大、服務貿易呈現逆差所造成經常帳持續順差之局

面，推動經濟發展從以製造業、外需為主之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為以服務業、內需為主之消費導向型經濟。

（二）貿易保護主義非解決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的良策

近年多數先進經濟體最富裕人口的所得成長極為快速，而最貧困人口的所得成長則極為緩慢，所得差距加大，助長反全球化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更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將這股反全球化情緒推升至最高峰。

然而，這股反全球化潮流，並非解決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問題的明智對策，因為任何一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即使可能暫時縮減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規模，但最終將導致全球資本與勞動產出的減少，既不利全球福利的增加，也不利各國經濟的發展。助長並惡化 1930 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原因之一，即是

美英等國採取高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停滯，係前車之鑑。得健全調整，將取決於諸多關鍵因素，特別是，主要國家平衡產業結構的進展，以及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的決心。

展望未來，主要國家經常帳失衡能否獲

參考文獻

- 申薈（2013），「要素流動與全球經濟失衡」，研究報告，上海社會科學院。
- 孫震（2012），「全球經濟失衡的隱憂」，講義，台灣大學開方式課程。
- 經濟日報（2016），「經貿轉骨，TPP 當戰略主軸」，社論，8 月 30 日。
- 蔡炯民（2006），「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出國報告，中央銀行。
- Barattieri, Alessandro（2014），“Comparative Advantage, Service Trade, and Global Imbala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92, Issue 1, January.
- Barattieri, Alessandro（2011a），“Comparative Advantage, Service Trade, and Global Imbalances,” *Working Paper*, No. 11-34, CIRPÉE, October.
- Barattieri, Alessandro（2011b），“Global Imbalances: Deficit Countries Specialise in Services, Surplus Countries Specialise in Goods,” Boston College.
- Borio, Claudio and Piti Disyatat（2011），“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Link or no Link？” *BIS Working Papers*, No. 346.
- Borchert, Ingo, Batshur Gootiiz and Aaditya Mattoo（2012），“Guide to the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ons Databas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PS6108, June.
- Caballero, Ricardo J., Emmanuel Farhi and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2008），“Financial Crash, Commodity Pric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8, 2, 1~55.
- Chinn, Menzie D., Barry Eichengreen, and Hiro Ito（2014），“A Forensic Analysis of Global Imbalanc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o. 66.
- DeSantis, Roberto A. and Melanie Lurhrmann（2006），“On the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Imbalances and Net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51.
- Deutsche Bundesbank（2015），“The Role of Trade in Go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Imbalances,” *Monthly Report*, January.
- Dooley, Michael P., Folkerts Landau D and Garber P.（2009），“Bretton Woods II Still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pp. 297-311.
- Dunaway, Steven（2009），“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44, Centre for Geoeconomic Studi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March.
- IMF（2014），“Chapter 4: Are Global Imbalances at a Turning Poin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 Roubini, N. and B.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 NYU, November 2004.
- VoxEU（2010），*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 eBook, June 23.

（本文完成於 106 年 2 月，作者為本行經濟研究處一等專員）